

经济思想史中的货币理论及其争论

王 璐

摘要：在经济思想史上，货币问题的讨论经历了各种复杂争论。根据货币的性质及货币理论与价值理论相结合的分析线索，可以将西方货币理论在经济思想史中的争论划分为货币自然观、货币财富观（重商主义）、货币面纱观（古典与新古典的货币理论）、货币经济观（凯恩斯经济学、后凯恩斯学派、货币主义等）以及货币的宏微观结合（货币理论的新发展）等阶段。从根本上讲，这些争论囿于经济学一贯强调实物经济的两分法传统而无法触及货币问题的核心。相反，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马克思经济学则展示了一个以现实资本主义经济或市场经济关系为分析基础的货币理论，表明现代货币经济的本质是基于社会关系及其利益冲突之上的资本主义竞争与积累，这正是马克思货币理论的研究目的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根本所在。

关键词：经济思想史 货币理论 争论 马克思经济学

一直以来，货币理论都是经济学最富争议的领域之一。从货币的本质与作用到货币政策的性质与目标，从货币领域的变动对整个经济的影响到货币经济学发展中的每一个分支，几乎任何一个基本思想观念都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和讨论。可以说，货币理论正是以其在经济学研究领域中的独特地位及其在现实经济中的无形魅力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研究学者。那么，到底什么是货币、货币的本质是什么？货币理论的各种流派自始至终在争论什么、或者说货币理论的研究归根结底包含了哪些问题？以此为据，本文试图把经济思想史上有关货币问题的各种争论悉数展现于读者面前，以求给出一个较为完整的货币经济学理论发展的轮廓。同时也表明，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马克思经济学中的货币理论，作为一个关于现代货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真正的货币理论，不但描述了现实资本主义经济之发生发展及周期与危机的运行规律，也道出了货币经济的本质是基于社会关系及其利益冲突之上的资本主义竞争与积累。

一、经济思想史中的货币理论

在经济思想史上，各种主流和非主流思想对货币问题的讨论经历了很多复杂的争论。这里可以将其按照两条线索展开，第一，围绕货币的性质，即什么是货币、为什么要用货币；第二，围绕货币理论与价值理论的结合问题。其中，关于第一条线索早在古希腊和中世纪时期就存在争论，主要的货币分析

从资本主义早期代言人——重商主义的货币财富观开始，包含了古典与早期新古典的货币理论、马克思的货币经济分析、凯恩斯的生产的货币理论以及围绕凯恩斯经济学而展开的各种争论，如新古典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及对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倾向持批判态度的后凯恩斯主义等。关于第二条线索，主要是 1936 年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一书出版以后面对凯恩斯经济学开辟的宏观领域缺少微观基础现象，主流经济学家们不断尝试将货币理论与相应价值理论相结合的各种努力。比如，或者为凯恩斯经济学寻找一个微观基础（如新古典综合派和新凯恩斯主义），或者在新古典理论基础上建立宏观经济学（如新古典货币经济周期理论和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但是，主流学者对货币问题的认识并没有按照历史的逻辑形成一个“进步的研究纲领”。相反马克思从历史的逻辑出发，认为货币是“一般等价物形式的发展”，本质上代表着一种社会关系，从而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正确把握了货币的性质。因此，主流经济学的各种努力似乎总是收效甚微，以至各种货币理论的争论存留至今。这里可以根据以上分析线索，将西方货币理论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货币自然观阶段

第一阶段是货币自然观（公元前 5 世纪 - 公元 14 世纪）。这种观点以自然经济和简单商品交换关系为基础，认为人们可以根据货币的自然属性特征

或区别去消除和减少相互之间对稀缺资源的争夺与冲突。因此,常常把货币起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作用的形式看作是违反自然的和不合理的,过多强调的是货币作为“虚构的财富”的特性,比如数量的多寡。

(二) 货币财富观阶段

第二阶段是货币财富观即重商主义(15世纪-17世纪中叶)。这种观点把货币看作是一国的唯一财富,强调衡量一国实力的尺度即是该国所拥有的金银量。通常认为,重商主义是经济思想史上最早以货币为核心的经济学说,它对立中世纪及以前的实物学派。如中世纪经院哲学家的公平价格学说,其思想主要来自于资本主义不发达时期的法国重农学派,并阐述了一种实物的劳动价值论和古典剩余理论。相反,重商主义者一开始就强调了货币,认为金属货币即金银就是财富,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都是为了攫取金银,并把货币与资本联系起来(如15世纪-16世纪中叶的早期重商主义,代表人物为法国的蒙克莱田);从这一基本观念出发,继而认为除了开采金银矿藏之外,对外贸易才是货币财富的真正源泉(如16世纪下半叶-17世纪中叶的晚期重商主义,代表人物为英国的托马斯·孟)。到了17世纪,商业资本开始发展并逐渐被工业资本主义所替代,因而伴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也出现了新的非金属形式货币的广泛使用,而这些货币一般已具有某种信用关系,因此晚期重商主义者也强调信用货币的创造,从而扩大了其货币财富观的范围。

在这一期间,货币理论的争论大致有两种对立观点,货币金属观(即金属主义的货币学说,也即重商主义者的货币财富观)和货币名目观(即早期的名目主义货币学说,代表人物为英国的斯图亚特;同时也包括早期的货币数量学说,代表人物如17世纪的洛克)。这两个派别在观点上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前者认为,货币的本质是财富,必须具有实质价值,而货币天然就是金属如金银,所以货币的职能是贮藏财富,交换的目的即是增加财富的贮藏。后者认为,货币是一种价值符号,只是名目上的存在,其流通由国家的权威规定,由此货币的职能是充当交换手段,因而认为金银的价值与一般商品的价值相同,其数量增加价值即被低估,而与其交换的商品价值则要上涨,从而反对金银即货币财富的观点。当然,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后,西方学者就不再这样简单地看待货币。因为一方面,他们认识到生产的扩大和经济发展需要更多的货币,而货币不必限于具有实体价值的贵金属,于是就有了银行券和纸币的流通;另一方面,他们认识到银行券和纸币的流通也不能是无限制的,而要有一定的价值储备作基础,由此货币职能也就逐步扩展到流通手段、计价手段和财富贮藏等方面。

(三) 货币面纱观阶段

第三阶段是货币面纱观,包括古典货币理论与主流新古典理论的货币观(17世纪末-20世纪30年代初)。主要是把市场经济视为物物交换的实体经济,认为货币是一种交换手段,好像不对经济发生实质性影响,即笼罩在实物经济上的一层面纱。实际上,这种面纱观也就是货币中性论,即认为“货币量增加所引起的正常影响就是引起一般物价水平的完全同比例上升”,而不构成真实经济的组成部分。显然,这种观点强调了货币的交易媒介功能,却忽视了货币的其他重要功能如价值贮藏和信用支付等,由此形成了经济学中货币与实物的“两分法”。但在具体观点的陈述上,古典理论与早期新古典理论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及各自的争论。

首先是古典的货币理论及其争论。比如在货币与实物两方面严格分离的古典传统中,相对价格被认为是所谓实际或非货币领域内由商品中包含的劳动量决定;货币的介入只是为了确定价格的绝对水平,即作为一种面纱仅仅是系统中的润滑剂和交易媒介。这就是典型的“两分法”,该方法源于古典学者萨伊“产品以产品来购买”的论断。不过,与古典学派之前有关货币性质的认识不同,古典学者更愿把货币看作“真正的商品”,如斯密把货币界定为一种从普通商品中分离出来、人人都愿意接受的商品。这种商品不但可以用来购买其他商品并克服物物交换的不便,而且重要的是其价值像其他商品一样是由生产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这样,货币同时也成为一种价值尺度,而商品的名义价格正是其交换能力的尺度,即“含有一定劳动量的价值”,从而奠定了古典劳动价值论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古典经济学探讨了货币供应量变化与价格水平变化之间的关系。如被誉为19世纪初货币数量论代表人物的李嘉图(1810)提出把所有各种商品放在等式一边,而把货币数量乘以它们的流通速度放在等式另一边。这也是交易方程式 $MV=PT$ 的雏形,其中 M 代表货币供应量, V 是流通速度, P 是物价水平, T 是商品交易量。后来,面对18世纪新发现的美洲金银矿导致金银不断流入欧洲,休漠的货币数量论曾把由此遍及欧洲的价格水平上涨归因于货币扩张。但古典学者没有把这一价格革命的起因追溯为货币现象,而是归结为金矿生产成本的降低,从而认为在经济活动受长期因素制约的情况下,交易方程式中 P 的波动幅度将在价值理论基础上确定。由于假定 Y 和 V 固定不变,因此 P 是方程中的自变量, M 是因变量,由此商品(或货币)生产成本的变化所引起的 P 的任何波动都将对 M 具有相应比例的影响。这即是以“古典两分法”著称的真实经济部门中的货币总需求的决定,并构成了基本的古典流通过则,其中,因果关系是从价格影响到货币,而

不是后来货币主义中的相反关系。

不过,基于斯密和李嘉图两位古典学者在理论上的差异,在古典的货币和信用领域也可区分为两个不同学派:一派以李嘉图为首,包括金块论者(又称“金本位主义者”,即《1810年金块通货报告》的支持者)及后来的通货学派(代表人物为劳埃德);另一派包括反金块论者及银行学派(代表人物为图克,倡议回归斯密的真实票据说),马克思曾有保留地赞成这个学派的观点。其中,李嘉图和通货学派强调商品的产出总量和商品货币总量的和谐均衡,并论证了无论在国内市场还是国际市场上均不需要政府干预。按照这一观点,货币在资本主义交换中的作用是次要的从而成为实际经济活动的“面纱”;同时认为,银行创造的信用会扰乱可能存在的和谐并导致商品价格的波动,因而遭到反对。但反金块论者和银行学派则强调,只要银行贷款的支付以非投机性为原则,那么在商品产出与信用货币关系之间的和谐同样具有很大可能性,因而赞成银行信用货币创造的一系列机制。比如其基于斯密真实票据说而发展的“回流法则”,认为银行券可以很快回到发行者手中以偿还贷款,因而长期中不会发生银行券发行过度的问题而保持货币均衡。当然,两个派别之间最大争论来自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金块争论(即金本位论战)。简单地说,该论战是在1797-1821年间英国发生的一系列关于货币理论与政策的争论。成立于1694年的英格兰银行,为满足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需要曾大量发行可兑换现金的银行券,由于连年对法作战造成国库空虚又在1797年宣布停止银行券兑现,从而引起纸币贬值、物价飞涨、金块价格提高等一系列现象。由此,英国议会内部形成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原因是纸币发行过量而纸币停止兑现又助长了这种过量发行,因而必须恢复战前的纸币兑现制,这就是对英格兰银行持批评态度的“金本位主义者”,以李嘉图发表于1809年的《黄金价格论》为代表。与之对立的是反金本位主义者即为英格兰银行辩护的人,认为这一现象是由于战时向国外额外大量汇款产生的压力造成而与英格兰银行的国内政策无关,其理论依据是斯密的真实票据说。1821年,英国恢复英格兰银行纸币与黄金的完全兑换,标志着金本位争论的结束。

其次是新古典的货币理论及其争论。从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到20世纪30年代的“凯恩斯革命”这一时期,新古典经济学的典型特征是货币理论与价值理论的“两分法”。在这种两分法传统中,经济主体(企业家和工人)从事经济活动的目的是获得物质产品而不是货币或货币利润,即抽象掉了资本主义货币关系,这也是货币中性的根源。比如早期的货币数量论认为,经济中货币数量增加的后果是使价格、工资等同比比例上升,而对实际经济变

量(如产量、实际工资、就业人数等)不会发生实质作用。换言之,货币引入不会影响经济的运行,即货币是不重要的。但在资本主义现实经济中,货币当然是至关重要和不可否认的;因此在进一步发展的新古典经济学那里,不得不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中加入货币。对此,主流经济学家帕廷金认为,根据两分法划分实物和货币的出发点来自纯粹的外生货币经济。其中,由商品的超额需求函数说明实物部分,而由货币超额需求函数说明货币部分。前一函数被假设取决于相对价格,后一函数除决定于这些变量外还取决于绝对价格水平。基于此,新古典学者创造了分别用于解释货币总量问题和商品交换相对价格问题的货币理论(总量理论)与价值理论(相对价格理论)。其中,前者以费雪的货币数量论和剑桥方程式为基础,现代版本是弗里德曼的现代货币数量论。而后者则以马歇尔局部均衡和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价值理论为核心,其现代版是阿罗-德布鲁模型。但无疑,这里的货币论和价值论仍然是经济学说的“两张皮”。比如在货币论方面,从货币数量的变动去看价格的变动,即所谓的“货币面”。而在价值论方面,或者从生产方面的实物经济出发,或者从商品效用的主观评价出发,去探讨价格、产量、分配,进而是最佳资源配置和相对价格结构等问题,即所谓的“实物面”。可以说,这种两分法的不全面分析是所有新古典货币理论的一个通病。

一般认为,费雪(1911)第一个系统阐述了新古典货币数量论,即现金交易方程式 $MV=PT$ 。在这个恒等式中, M 代表货币存量, V 为货币流通速度,即单位美元存量每年转手次数的平均数, P 为货币交易中的平均价格水平, T 代表这些交易的每一年物质流量。费雪认为,通过货币进行交易的实际量 T 是外生的,流通速度 V 取决于制度和习惯,也不依赖于方程其他变量,因而外生货币供给 M 的变化在上述因素既定下能使价格水平 P 发生同比例变动。显然,这一分析复活了古典学派的假设,即货币因素至少在长期内不会影响经济活动,也就是新古典两分法的含义。这里,新古典理论对货币媒介商品交换作用的分析有两个角度:一是代表一般购买力,二是作为购买力的暂时栖身。其中,货币的前一作用在交易说中得到了强调,货币的后一作用则在现金余额说中得到了强调,这就是由剑桥经济学家马歇尔(1923)、庇古(1917)等发展起来的现金余额说。若用 k 表示人们持有的货币量占名义国民收入的比重,则剑桥货币需求函数可以表示为: $M_d = kPQ$,这也是著名的剑桥方程式。其中, M_d 是持有名义货币余额的需求,即货币收入减去支出后的余额,也称现金余额; PQ 是名义国民收入。剑桥经济学家认为,货币(即有形货币加上支票户存款)的供应由货币当局决定是外生的,由于 k 可以视为常数,产

量或实际国民收入 Q 由生产技术和消费或家庭偏好决定也可视为常数,因此一般价格水平 P 只能由 M 决定。这表明,货币数量的变化可以决定物价水平,但长期内不会产生真实效应。通过以上两个方程式的推理,也就得到了新古典货币数量论的简单表述,即货币供给的外生变动只会引起一般价格水平的同比例变动,因而货币的职能不过是一种交换媒介。然而,早期新古典的货币方程式并不能表明货币量变动与利率的关系,因而也称为传统的新古典货币数量论。后来,又出现了从收入-支出分析介入的收入说货币数量论,其特点是从流通领域深入到生产领域经由利率因素作为投资和储蓄关系的杠杆,以此探讨货币对价格水平波动的影响。这样,就将货币量的间接作用深入到生产领域,从而引出货币量和经济周期波动的关系。其中,威克塞尔是由传统货币数量论向收入、储蓄和投资分析的转折点;而 20 世纪 20 年代信用周期理论的出现更使收入说得到充分发展,其代表是罗伯森。此后,货币经济学家都倾向于按照收入交易而不是总交易来表示货币数量方程,即 $MV=PY$, 其中的 Y 代表实际收入。因此,新古典有关货币问题的各种理论争论,不仅包括具有代表性的费雪的现金交易说和马歇尔的现金余额说,也包含了威克塞尔的累积过程说、霍特里的信用周期理论、哈耶克的中性货币说以及罗伯森的强制储蓄说等。但这些理论表达的主要含义,仍然是货币并不对经济活动发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

(四) 货币经济观阶段

第四阶段是货币经济观,主要指《通论》出版以后的凯恩斯经济学及后凯恩斯主义学派(20 世纪 30 年代至五六十年代),认为市场经济中的各种活动均通过货币来实现,货币对经济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另外,由弗里德曼重新表述的现代货币数量论即货币主义,也强调了货币在短期内对经济变动的重要作用,但因其坚持长期均衡时的经济仍然遵循两分法而与凯恩斯的货币经济观有着本质不同,从而出现了货币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各种争论。

首先是凯恩斯经济学的货币理论。面对 20 世纪 30 年代的经济大萧条(1929-1933),1936 年《通论》的出版标志着凯恩斯经济学与信奉充分就业信条的新古典理论的决裂。凯恩斯极力反对新古典将资本主义经济分割为实物与货币两方面的做法,他致力于重新塑造的“生产的货币理论”正是要冲破传统的货币数量论,即“经济学一方面分为价值论和分配论,而另一方面分为货币论,这种分法我认为不正确”。因此在《通论》中,凯恩斯首先否定了萨伊定律,认为该定律只适用于物物交换经济而不适合于资本主义货币经济。用凯恩斯的话说,“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在最后比开始赚取更多的货币,企业没有别

的目标。这是企业(货币)经济的本质特征”。显然货币在这里起到关键作用,即宏观经济中所有的变量均为货币量值或名义变量,这就是与总就业和总产量相联系的货币经济理论(或有效需求的货币利息理论)。其中的货币不仅具有交换媒介和价值贮藏作用,同时也是组织生产的手段,即货币连接着生产和交换。通过这种新的货币经济观,凯恩斯把货币以一种实质性的方式融入真实经济过程。凯恩斯认为,这里存在着一个与新古典实物利息率(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完全不同的利息率,即把“货币的自己的利息率”作为一般利息率来实现加总问题。在《通论》著名的第 17 章,凯恩斯以这个“货币的自己的利息率”作为宏观经济学和货币理论的基础,从而把货币的信用关系和货币的自己的利息率归之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在此,利息率不是调节资本的供给与需求或储蓄与投资,而是调节货币的供给与需求;虽然投资或资本边际效率依赖于利息率,但利息率并不是货币数量论中的资本价格或取决于资本的边际生产力,而是来自于货币的灵活偏好,即利息是人们放弃货币灵活偏好的报酬。因此,投资总是以获取利润为目的,即资本效率不可能低于货币的边际效率——利率。这样,货币资产及其利率在经济体系中将具有限定社会总资本存量的特殊作用,由此货币对真实经济的影响就是非中性的。由此,凯恩斯不仅驳斥了传统货币数量论“价格上升仅仅是货币数量增加的结果”的说法,而且强调了宏观经济分配中利润的决定只取决于对货币利息率的依赖。因而在凯恩斯的理论中,货币不再是所谓的“面纱”,它通过利率对生产发生了实质性影响。

在此基础上,凯恩斯表明了货币理论的重要一点,即货币联系着过去(现在)与未来,其原因是持久性资产的存在。比如,货币联系到过去(现在)是因为资本存量的价值是变动的,货币联系到未来是因为投资和过去的资本存量的价值取决于对未来利润流量的预期。他认为,如果把货币供给和货币的“自身利息率”依赖于资产抵押,从而使货币根植于“过去(现在)与未来”或持久性资产存量与未来的收入流量,即可以把货币和利息理论发展为一种完全不同于货币数量论的货币价值理论或货币经济的新的一般均衡理论。在这一理论中,凯恩斯使用工资单位作为价值的计量标准,以根据特殊劳动者的报酬来换算它的劳动时间。这样,如果 M 代表工资(和薪金)总额, w 代表工资单位,而 N 代表就业量,即: $M=N \cdot w$ 。这里的 M 是用货币数值表示的国民收入;这里的工资单位则联系到货币对劳动的支配力,所以是劳动货币化的一个表示。通过把货币价值的量与就业量这两个基本数量单位联系在一起,凯恩斯表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货币性质,其中,正是由资本主义的货币金融关系而不是技术关系决定着

整个社会的产出和就业水平。总的来说,凯恩斯反对两分法的主要目的是试图构筑一种能够将价值、分配理论与货币理论联系在一起的生产的货币经济理论。按照这一思路,凯恩斯理论中使用的与现实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相一致的所有宏观变量(包括经济增长率、储蓄、投资、工资率、资本存量价值和收入流量等所有按货币价格计算和加总的统计资料)都将只是名义变量,而不与要素的边际生产率和效用偏好所决定的实际变量相同。然而,凯恩斯没有表明这一命题的逻辑基础,即提出一种新的价值和分配理论来表明其货币理论,或者说无法回答市场经济中相对价格和分配是如何决定及与宏观变量之间的联系。比如凯恩斯表述的是,一旦实现了充分就业则新古典的资源配置理论仍然有效,从而使得长期支配人们思想的新古典实物分析又在此后的经济学发展中逐渐淹没了“凯恩斯革命”。

其次是后凯恩斯主义的内生货币供给理论。《通论》发表以后,货币理论的研究被极大拓展,很多学者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凯恩斯的灵活偏好理论,并把货币分析扩展到各个领域,其中比较著名的是后凯恩斯主义的内生货币供给理论。一般认为,后凯恩斯经济学的主要奠基者是罗宾逊、卡尔多和卡莱茨基,而第二代后凯恩斯主义者的杰出代表主要有明斯基、戴维森、克雷格尔和哈考特等。在这些后凯恩斯主义者看来,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凯恩斯所强调的“历史时间中的不确定性”,即认为在一个不确定的历史时间中决策是事先作出的,结果是事后得到的。比如,货币作为财富或价值贮藏手段的特殊作用就是来自于利息率关于未来趋势的不确定性。与此相对照,新古典研究的是在确定性条件下的物物交换经济,由于没有一个与经济真实部门相互作用的货币体系,从而货币的引入都是以货币数量论的形式出现。其中存在着货币商品的生产函数,货币供应量由中央银行外生决定,所以从长期看货币供应量仅仅能够影响物价水平,而对实际产出和就业并不能产生持久作用。相反,在后凯恩斯主义的货币-信用经济中,货币并不具有生产意义上的供给函数,其存在于某一时点上的货币供应量主要取决于银行贷款的净额。这样,在不确定条件下的货币就不再是中性的。同时在货币传递机制上,后凯恩斯主义者认为货币可以被视为其他金融资产的相近替代物,因为这些资产可以像货币余额一样作为价值贮藏的手段。由此,就把货币对真实经济作用的起点放在家庭及企业资产选择的账目上,即企业家和家庭可以根据以货币标名的契约承担义务,从而货币制度在信用经济的运行中将起到关键作用。

因此,温特劳布等人以内生货币供给理论取代了凯恩斯的货币理论,并进一步加强了货币对实物

经济活动影响的非中性观点。“第一,拒绝资本主义经济自然趋向长期、充分就业均衡的理念;第二,拒绝关于货币的收入流通速度是稳定的并且独立于利息率的观点;第三,拒绝货币数量说中的由货币供给到名义收入或一般物价水平的因果分析结论。”而且卡尔多(1982)认为,在货币-信用经济中任何时候的货币供给量都由货币需求决定,即货币供给直接随着公众对现金和银行存款的需求变化而变化。而货币需求是名义收入的函数,即货币需求的变化是利息率变化所导致的生产和收入水平变化的结果,换言之利息率对“持有货币的愿望”没有直接影响,只会有因收入水平的变化引致的间接影响。因此,货币政策的目标是确定利息率而不是货币存量。中央银行对货币存量没有控制能力,货币需求的任何增加都将由作为最后贷款人的中央银行予以满足。因而在既定的利率水平上,货币供给曲线的弹性是无限大或水平的。^⑪这样,后凯恩斯主义对主流货币理论的反对也就表现为货币数量论中因果关系的颠倒,即货币供应被看作是名义收入的函数而不是相反。由此在后凯恩斯主义那里,现代信用经济中的货币供给必然是内生的,而货币信用经济的运转对于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则是必不可少的。然而,作为一个长期组织松散的学派,后凯恩斯主义在不断的演化和发展中、特别是在与主流经济学的持续争论中,并没有显示出观点的内在一致性、综合性和强劲性,所以其对货币理论的基础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说明而导致争论不断。

再次是货币主义的货币理论。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经济学界对货币数量论的兴趣开始复兴并逐渐占据经济政策的主导地位,其中主要是弗里德曼重新表述的现代货币数量论思想即货币主义,与当时的凯恩斯主义形成对照。比如正统凯恩斯主义强调真实扰动(如投资和自主消费)是货币收入波动的主因,而现代货币数量论中的货币存量变化则被视为解释货币收入或名义收入变化的主要因素。弗里德曼(1956)认为,“对于经济中最终的财富持有者来说,货币是一种资产,是持有财富的一种形式。……利率反映了财富这一存量与收入这一流量的相互关系,所以,如果以 Y 代表收入的总流量,且以 r 代表利率的话,那么,总财富则为 $W=Y/r$ 。”^⑫由此,弗里德曼假设对货币的需求像对任何其他特定资产的需求一样会给持有者带来服务流,而全部财富在资产间的分配情况取决于各种资产的相对收益率。假定货币需求函数的简化形式为: $M_d/P=f(Y_p, r, P_e, u)$,其中, M_d 代表名义货币余额需求, P 代表一般价格水平, Y_p 代表持久收入, r 代表金融资产收益率, P_e 代表预期通货膨胀率, u 代表个人偏好。该式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时,财富水平越高、

其他资产收益率越低、预期通货膨胀率越低,货币需求就越大。这样,在均衡情况下,财富在各种资产之间的分配遵循新古典边际收益率均等原则。当边际收益率不等时,追求最大效用的个人会在不同资产之间重新分配财富,因而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理论也即新古典主义的“资产组合选择理论”。但与凯恩斯不同,这里的资产组合不仅包括货币和债券,也包括其他金融资产乃至实物资本。这样,资产组合的调整过程对货币主义传导机制来说是重要的,它可以通过资产收益结构的改变直接对就业、产出和收入产生影响,而无须通过凯恩斯强调的利率传导。

另外,弗里德曼强调了名义货币数量变化与实际货币数量变化在长期与短期的区分,从而没有将货币影响真实经济的大门完全闭合。“货币的名义数量就是以任何一种被用来代表货币的单位所表示的货币数量。货币的实际数量就是以货币所能购买到的产品和劳务的数量来表示的货币数量。”^⑭通过这种区分,货币存量的变化会在一定时期对真实部门产生影响,如短期中实际部分可以看成是一种稳定状态而货币部分则是不稳定的,正是这种差异产生了短期经济波动。不过长期均衡时的经济仍然遵循两分法,其中所有名义量值都决定于货币关系,而所有实际量值都决定于相对价格反映的技术关系。“从长期来看,货币数量的变化对实际国民收入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对于过去几十年中实际国民收入的变化来说,非货币因素的作用是唯一重要的,而货币却无关紧要。”^⑮而且在弗里德曼看来,这种影响也反映在货币供给方面。他强调货币当局控制的货币供给只是通常的 M_2 ,即只包括公众手中通货量和商业银行存款总额而不涉及其他流动性资产。既然货币供给决定于货币体制而是稳定的,那么货币供给与实际货币需求就是各自独立决定的,影响货币供给的因素并不能影响实际货币需求函数的稳定性。这样,名义货币需求可随时适应货币供给的变动而作充分调整,这就进一步加强了弗里德曼关于短期内货币影响名义产出水平而长期内货币只影响物价水平的观点。但是,正像凯恩斯经济学缺少一个价值、分配理论基础一样,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也缺少一个相对价格理论。同时,为解释货币存量与名义收入与价格的关系,弗里德曼在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基础上又加入一个外生货币供给假定。因此,弗里德曼要说明的是从货币的变化如何到价格和收入的变化而不是相反。这样,标榜货币重要的弗里德曼实际上并没有揭示资本主义的货币金融关系,而是要求人们不要只注意两分法世界的实物一面,同时也要注意货币方面。显然,在长期经济中重新回到两分法的分析使弗里德曼的货币因素在经济政策中仍然是由中央银行决定的外生变量,从而成为后凯恩斯主义批评指责的对象。正如经济学家布

劳格所说,“最近二十年中凯恩斯主义者与货币主义者之间的辩论,应该是整个经济思想史上最动肝火而又没有意义的论战之一,常常与最黑暗的中世纪时期的争论差不多。”^⑯

(五) 货币理论的宏微观结合阶段

第五阶段是货币理论的宏微观结合,主要指《通论》出版以后围绕凯恩斯经济学缺少微观基础而试图融合货币理论与价值理论的观点,如新古典凯恩斯主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等(20世纪70年代以后)。《通论》发表以后,经济学领域被区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其中,居于微观领域统治地位的是以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体系为基础但缺少货币分析的价值理论,而建立在IS-LM模型基础上的凯恩斯主义宏观模型则被认为缺乏微观基础,在货币理论上也是如此。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经济学理论对微观基础的需要导致宏观经济研究中的新古典倾向日渐显现,出现了新古典主义与新凯恩斯主义的对立。前者认为,通过放弃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可“使宏观理论适合微观理论”,即在新古典基础上建立宏观经济学(如新古典的货币经济周期理论和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后者认为,通过重建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可“使微观理论适合宏观理论”,即为凯恩斯经济学寻找一个微观基础(如新古典综合派和新凯恩斯主义)。关于这里的宏观经济学之微观基础问题,关键在于货币理论与价值理论的融合。在这方面,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大致有以下几种思路。

比如第一种思路,是在凯恩斯主义框架内为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和货币理论即IS-LM分析框架寻找微观基础,如萨缪尔森、莫迪利亚尼的消费需求函数,托宾、鲍莫尔的现金交易需求模型,托宾的资产组合选择理论等,这些发展即新古典综合凯恩斯主义。与之相竞争的,是弗里德曼后期关于持久收入的消费函数假说,即包含全部财富存量和名义收入流量的货币需求函数。但正如大多数学者认为的,货币主义分析框架的实质仍然是将重新表述的新古典货币理论融合进凯恩斯主义分析框架。第二种思路,是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框架内为货币理论寻找微观基础,即将新古典价值理论与新古典货币数量论融合在一起的“瓦尔拉斯-希克斯-帕廷金分析传统”,该传统吸收了凯恩斯灵活偏好理论的存量分析方法。20世纪60年代后期,阿罗、德布鲁等新古典学者对该传统提出批评,并通过交易费用、信息和不确定性等因素将货币引入其中,强调了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的职能。同时,萨金特、华莱士等另一些新古典学者则在迭代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中力求实现价值理论和货币理论的融合。由于迭代模型中的货币是一种资产,主要用于资源的跨时转移,因而强

调了货币的价值贮藏职能。^④可见不论形式如何,以上这些模型都是从货币职能的某一个方面试图将货币引入瓦尔拉斯均衡框架,但作为瓦尔拉斯经济的各种变形模式,这些模型并没有改变其实物经济的本质。另外,与上述使宏观理论适应微观理论的新古典方法不同的思路,是使微观理论适合宏观理论的新凯恩斯主义方法,即包含某种成分名义刚性的粘性价格预期模型,这一方法主要由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费希尔、萨默斯等人发展起来。与新古典经济学家一样,新凯恩斯主义具有理性预期、个体最优化行为假设,但不同的是他们认为各种不完全性或刚性会使价格调整相对缓慢或粘性,因而市场不能如新古典模型那样迅速瞬时出清,即短期内的货币冲击能够对经济产生真实效应,但经过一段时间以后的经济最终会实现供求均衡,即长期中的货币仍然是中性的。由此,主流经济学在新古典基础上进一步融合,宏观经济学中的“新古典研究传统”开始替代“凯恩斯研究传统”,即由新古典实物的相对价格分析替代了凯恩斯经济学的总量货币经济分析。这样,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之后,主流经济学的争论主要是在新古典真实均衡周期理论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之间展开。如前者秉承新古典研究传统,强调自由市场体系各经济行为人的最优化力量,把作为凯恩斯经济学核心的货币特性彻底摒弃于新古典一般均衡分析体系之外,认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已经死亡”。后者则试图通过发展从最优化行为中产生的具有工资和价格刚性的粘性价格预期模型来复兴凯恩斯主义。这种“凯恩斯主义的复兴”与70年代吸收了弗里德曼“货币幻觉”、“自然率假说”和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以及卢卡斯“理性预期”假说的凯恩斯主义模型的做法一脉相承,从而表明失业来自于刚性工资和价格、不完全或不完整信息及不完全合同和各种不确定性。目前,在西方流行的新凯恩斯主义教科书中,往往是将上述主流经济学的各个流派及其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即所谓经验证据)综合起来,并在新古典生产函数的基础上建立起宏观经济学体系。不过,这一体系中有关凯恩斯最初强调的货币经济的特征和有效需求原理都被彻底抛弃了。

总的来说,以上讨论实际上都涉及凯恩斯经济学的货币理论。从根本上讲,凯恩斯货币理论与主流经济学货币理论对立的关键不在于内生还是外生货币供给的假设,而是“货币数量论”与“货币的价值理论”的对立。即这里是否存在一种实物的总量生产函数,一旦不存在这种总量生产函数、从而不存在名义变量与真实变量的划分,则所有以货币量值计量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的变量都将独立于技术关系而由货币金融体系决定。由此,如果所有名义变量的决定都取决于货币供应量,则内生货币供给将

是决定这些变量的基础。但是,目前各种争论在本质上依然被货币数量论所支配,从而货币数量的变动只影响价格水平。显然,只要争论建立在两分法的基础上,那么新古典货币数量论的基本命题就会一直持续下去,而这种新古典实物两分法的主要原因,正是在于对经济问题的研究与分析完全建立在由技术关系决定的生产函数基础上,由此导致其对经济事实解释力的匮乏而成为“剑桥资本争论”逻辑批判的对象。当然,我们在批判主流经济学的同时也可以找到一个以现实资本主义经济或市场经济之社会关系分析为基础的新的货币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货币理论。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货币理论

如上所述,经济思想史中有关货币问题的讨论经历了很多争论。但是,这些主流和非主流学者对货币问题的认识往往根植于实物经济的两分法传统而无法触及货币问题的核心。相反,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货币理论,不但系统描述了现实资本主义经济之发生发展及周期与危机的运行规律,也道出了现代货币经济的本质正是基于社会关系及其利益冲突之上的资本主义竞争与积累。

在马克思那里,货币理论与其价值理论即劳动价值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⑤马克思认为,货币源于商品、是商品经济内在矛盾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商品矛盾运动中价值形式发展的必然结果。作为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表现形式,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两个因素。同时,这两者又同生产商品的劳动所具有的两重性,即创造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和创造价值的抽象劳动相对应。其中,商品的使用价值是生来具有的,就是它本身的自然形态;但其价值形态则只有通过迂回的道路、在和别种商品的交换中才能获得,也就是商品的交换价值。由此,通过简单价值形式—扩大的价值形式—一般的价值形式—货币形式的历史发展过程,马克思论证了货币的产生。^⑥这个货币与实物存在根本区别,它联系到与使用价值或技术无关的价值形式。马克思指出,变成货币的商品在进入流通之前已具有价值,这个价值由生产货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决定。货币一旦形成,商品的交换过程就成为商品流通公式“ $W-G-W$ ”;在这里,商品是单纯作为商品而出现,货币则是单纯作为货币而出现,即简单的商品经济形式。但是,当出现了雇佣劳动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以后,即当资本家用一笔预付的货币雇用劳动和购买生产资料时,他所支付的不是劳动的价值而是劳动力的价值,目的就是要获取剩余价值(货币的增殖),这时商品交换公式就成为“ $G-W-G'$ ”的流通公式,这种流通形态随即成为资本流通的一般形态。这样,作为

生产的目的,使用价值的转化在这里就为交换价值的量的扩大所代替。换句话说,只有当资本家从中得到一笔数目更大的货币时,他才有理由投资于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而这个增加的货币即 G' 与 G 的差额,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其货币表现即为利润,它为资本家提供了“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同时,也正因为货币增殖的出现($G' > G$),使得这个形态中的货币不再是单纯的货币,而是成为了资本形态的货币,即货币资本。在这里,货币的增殖即利润的获得成为资本流通的推动力,它也是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得以运转的动力。^⑨

显然在马克思的理论中,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用于表示商品的价值是产生于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通过货币流通公式,马克思区分了简单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表明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特征在于货币的增殖,而资本家也是使用货币购买资本品和支付工资并通过出售商品来得到这个增加的货币。这样,经由价值形态到货币形态的发展以及商品流通公式在不同经济发展时期的不同表现,马克思强调了货币对商品生产尤其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重要意义。马克思认为,货币不仅是财富的一般的物质代表,也是资本主义生产中所进行的各种劳动活动的一切产品的形式。换句话说,货币的普遍性使得一切不同的劳动活动彼此发生联系。比如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所有的统计资料都是厂商按照以货币为基础的成本收益得到的,由此厂商的行为目标和行为基础都是以货币为导向的,即为了追求货币利润的最大化。其实,当货币成为对劳动的支配权和企业成本-收益计算的价值尺度,而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在于获取按货币价值计算的利润或货币增值时,这种总量货币价值的决定将联系到货币经济背景下由货币引起的市场竞争博弈规则。比如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中,货币不仅是价值转化为资本的起点,而且也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最终目的。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生产并不是追求以使用价值表现的财富,而是追求以货币价值所表现的社会权力。如果商品的价值和剩余价值不能实现为货币,那么它对资本来讲就一文不值,从而追求不断增加的货币量也就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目的。

当然从一般意义上讲,任何具有价值的商品都可以用来充当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交换媒介),因而在纯粹的经济分析中,也可以抽象掉货币来分析商品间的交换价值并得出一般均衡条件,但这种分析与资本主义追求货币价值的货币经济本质并不相容。马克思认为,货币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最主要的功能在于它的贮藏功能和支付功能(及其所延伸的信用功能)。其中,前者不仅产生了人们对作为一般财富代表的货币的追求和凯恩斯由灵活偏好决定的

利息,而且决定了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买与卖之间不能同时完成,从而形式上的财富分配与实际财富分配的不一致。后者则产生了资本主义的信用关系,它同样会导致价值分配、价值交换与价值实现之间的不一致。这两种功能在马克思货币理论中具有核心作用,也是其价值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凯恩斯之前却一直被忽视。虽然凯恩斯在《通论》中重新发掘了货币的这两种功能并引起了“凯恩斯革命”,但在此后以新古典综合派为代表的所谓“理论发展”中,货币的这两种功能却又基本被抛弃了。实际上,正是货币的这两种功能使资本主义经济不同于其他经济。抽象或抛弃了货币的这两种功能,自然也就无法正确地认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

马克思是从资本主义经济的源头——商品交换的研究开始,通过货币形式的出现及其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揭示出现实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的本质。他认为,人们之所以能够进行商品交换,是因为商品中凝结着人类的抽象劳动这种共同的东西,它是商品价值的源泉。但是,推动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的发动机并不是在生产中合理的分配劳动资源,而是使社会产出价值最大化的动机即资本家对货币利润的追求,其来源正是活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因此对资本主义来讲,货币不仅是资本的前提条件,而且是资本追逐的唯一目标。显然,这里对市场经济竞争博弈的分析联系到一个重要的游戏规则,即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的生产目的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利润和资本积累,这也是马克思经济学所表明的资本主义经济性质的核心命题。不过,这里的资本积累并不是新古典理论的技术和实物,而是纯粹的货币价值符号的增加,即竞争的目的是为了纯粹的价值符号——货币,它构成了整个市场经济竞争的核心。无疑,许多传统货币理论都没有从这种资本主义的货币经济特征中认识货币。比如,为什么是货币而不是其他别的物质可以承担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一般功能呢?这只有在货币对人与社会关系的作用中得到合理解释。就像马克思指出的,西方学者总是习惯于从扩展了的物物交换过程所遇到的外部困难中寻求货币的起源,却忘记这些困难是从交换价值的发展、因而是从作为一般劳动的社会实践发展中产生的。因而只是把货币产生的根源归结为纯粹意识的作用,即为了消除物物交换行为在技术上的不便而“被巧妙地设计出来”,并认定货币的本质“实际上只是买卖活动的工具”^⑩。但事实上,货币作为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和一般劳动时间的对象化,其本质正是以物的形式所表现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如在马克思列举的简单交换形式“20 码麻布 = 1 件上衣”中,一旦劳动产品麻布通过了货币的买卖就表现为:“现在麻布通过自己的价值形式,不再是只同另一种商品发生社会关系,而

是同整个商品世界发生社会关系。^⑩也就是说,一旦货币作为商品价值量的符号,就成为社会经济关系的量度单位和进行抽象劳动的时间单位。由此,作为商品交换尺度的价值量即是对人与人关系的度量,而不是对商品自身或满足人类需要的物质性质的度量。显然,马克思之所以坚持劳动价值论而反对把商品价值理解为新古典的效用价值或使用价值,其基本立足点也在于此。在马克思看来,货币的本质就是人们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某种脱离了社会关系的独立事物,在货币与人和人之间始终存在着内在的不可分割的必然联系。就像哈里斯在《货币理论》中总结的,“货币的最基本特征:事实上货币是一种社会现象。这就是说,货币之所以存在不仅是因为人是社会生物以及人的一切活动(包括经济活动)都在一个社会框架中进行,更重要的是因为货币只存在于一个特定的社会与经济框架之中。”^⑪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把货币的本质联系到社会关系。他强调只有货币才能表示劳动时间的价值,即货币是具体化在商品中的劳动的衡量标准,而当只有货币能够作为价值尺度来计量价值总量时,将与只有相对价格意义的一般商品相区别。由此,马克思抽象掉所有其他因素(如使用价值和劳动生产率)而把价值和剩余价值归之于抽象劳动时间,以此表明资本家雇用工人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利润,即剩余价值来源于剩余劳动的资本主义关系。而且,在马克思剖析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以此进行的资本主义积累也是源于这种对纯粹货币价值符号的追加,即资本主义竞争的目的是为了货币的增殖。这实际上也就是马克思所说“货币拜物教”的真正意义,即在于竞争和支配他人的权力与金钱所带来的社会地位。比如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资本家追求金钱所带来的货币拜物教和对人的异化以及资本对劳动者的支配是极端残酷和不人道的,特别是1825年的经济大危机造成了大量工人的失业与贫困化,收入分配的严重两极分化更是激发出大量的社会矛盾。因此,当时的资本主义并不是市场经济中平等竞争的游戏规则而是真正的阶级斗争,即由剩余价值即增殖的货币利润所代表的资本家与雇佣劳动者之间不可调和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而推动这一生产目的或不断加剧这种对立关系的,正是资本主义积累。由此推论出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性质,即资本家获取利润和进行积累的目的是表明成就和社会地位。一方面财富或资本积累成为资本主义竞争的目的和标准,另一方面资本也是竞争的手段,即可以支配他人的劳动。比如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商品交换是获取货币增殖的手段,但这种货币的增殖并不联系到使用价值或实物,而是联系到基于资本积累与社会竞争之上的价值或货币价值。显然,这一点恰恰来自于人类的社会性质,

或者用马克思的话讲,人的本质即在于他的社会性,而货币亦然。

三、结语

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与自然科学相比似乎有很大差异,这里的关键在于经济学从来不是一门“纯粹”的科学,经济理论的发展总是与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进程紧密相连。其中,社会经济的发展阶段和制度的更替演变是影响经济理论变迁最重要的因素,尤其是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政治制度中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及其利益冲突,更使得经济学不可能脱离“辩护”的轨道而成为一门“纯粹”的科学。回顾几个世纪以来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历程,其有关货币问题与货币理论的讨论经历了多种流派及其分析方法的更迭与交替。从根本上来讲,这些争论都与经济学一贯强调实物经济的两分法传统有关,但主流学者往往不能抛却这种狭隘的两分法认识而无法触及货币问题的本质与核心。相反马克思从历史的逻辑出发,认为货币是一般等价物形式的发展,本质上代表着一种社会关系,从而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展示了一个以现实资本主义经济或市场经济关系为分析基础的货币理论。马克思认为,在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中,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即在于获取按货币价值计算的利润或货币增殖,而这种按货币价值计量的总量恰恰来自于资本作为一种预付、是对劳动的支配这种特殊的资本性质。比如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货币不仅作为面纱停留在流通领域,而是必须通过资本家预付货币资本和雇用劳动而进入生产领域并最终生产出能够增殖货币利润的剩余价值,由此联系到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及其利益冲突之上的资本主义竞争与积累,这正是马克思强调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货币经济的本性所在。而且在现实中,也正是这种资本主义货币经济关系使得各种异质的资本品或消费品可以加总为总的价值量,即目前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的总量关系,而这些以货币量值表示的总量如国内生产总值、总资本、工资与利润等,作为一种价值形式也就构成了现实资本主义竞争和积累的形式或工具。

相比之下,建立在表明技术关系生产函数基础上的新古典理论,由于外生货币供给的假设只能将货币作为面纱加入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从而降低了货币对现实经济的重要性。同时,作为一种与土地、劳动并列的生产要素,新古典理论中的资本不但脱离了历史和现实,而且作为异质的资本品也不能实现加总,这更使得作为新古典理论基础的总量生产函数失去根基。与新古典理论不同,凯恩斯强调了货币的重要性,而且试图把价值、分配理论与货币理论联系起来建立一种新的货币经济理论,如通

过货币自己的利息率,凯恩斯把货币的信用关系归之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但凯恩斯没有提出一种新的价值和分配理论基础来表明其货币理论,使得长期支配人们思想的新古典实物分析又淹没了凯恩斯革命。20世纪50-60年代的“剑桥资本争论”将新古典逻辑悖论公布于众,由此复兴了古典和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即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联系到货币量值的国民收入核算。其实,当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现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均衡和效率时,必须把货币经济的性质或资本主义经济性质作为理论的基本假设。因此可以说,经济学不是研究生产的技术关系,而是研究特定的以货币竞争为核心的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由此产生市场经济中货币价值形态的成本-收益计算和以货币量值为基础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宏观变量,从而表明现实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发生发展及其运行规律,正是马克思货币理论的研究目的区别于其他货币理论的根本所在。

注释:

经济学家熊彼特曾指出货币量值论的错误在于,它把货币的历史起源同货币的性质混淆在一起。比如就货币的历史起源来说,虽然一些商品由于特别好卖而被当作交换的媒介,但货币的性质却与其材料的商品性质毫无关系。参见熊彼特:《经济分析史》,中文版,第1卷,43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中文版,14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如18世纪早期货币数量论代表人物休漠认为,货币并无内在价值,只是一种流通手段,同时充当计算单位;一旦进入流通,货币也仅获得一种“想象的价值”,其价值量大小由货币的需求与供给共同决定。

《李嘉图著作与通信集》,中文版,第3卷《论货币问题》,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中,斯密提出基于流通渠道的真实票据说。如将必要的货币流通量喻为“流通渠道”,认为一国流通货币有限而非任何数量货币都可进入流通,因而多余货币会自动退出流通。由此,按照真实汇票预付银行券(可兑现纸币),银行券就不会出现过度发行现象。该学说反映了18世纪苏格兰自由银行制度下各商业银行的活动规律。后被李嘉图和通货学派否定,继而又被银行学派更新为“回流法则”复出。

帕廷金:《货币、利息与价格》,中文版,187、18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文版,30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Keynes,M.,1973.The Collected Working of John Maynard Keynes,London:Macmillan,p.89.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文版,4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罗西斯:《后凯恩斯主义货币经济学》,中文版,8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⑪ Kaldor,N.,1982 . The Scourge of Monetarism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p. 24.

⑫《弗里德曼文萃》,中文版,361~386页,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

⑬⑭弗里德曼:《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结构——与批评者商榷》,中文版,13、54页,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

⑮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中文版,23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⑯在早期的阿罗-德布鲁时期一般均衡模型中,货币完全不起作用。由此,如何将货币的作用引入一般均衡的微观经济模型以回答货币是否是和为什么是有用的商品,便成为建立货币理论微观基础的首要问题,即著名的“哈恩难题”。当时的西方文献中曾经存在两种引入办法:其一是利用拉姆齐无限期模型将货币直接置入效用函数即扩展拉姆齐模型,允许消费和实际货币余额进入效用函数;其二是将货币理论发展置于迭代分析框架内的迭代模型,该模型始于萨缪尔森的消费信贷模型,后被其他学者加以发展和系统化。

⑰美国学者莫斯利评论说,“马克思的货币理论优于新古典货币理论的主要原因在于:马克思是在价值理论的基础上解释了货币的必要性,并由此得到一个能够将价值理论与货币理论结合在一起而不可分割的整体。”Moseley,Fred,2005. Marx's Theory of Money: Modern Appraisals .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Ltd.,p.2.

⑱恩格斯曾就此指出,“他(马克思)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货币理论是第一个详尽无遗的货币理论”。马克思:《资本论》,中文版,第2卷,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⑲马克思:《资本论》,中文版,第1卷第4章(“货币转化为资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⑳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文版,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㉑马克思:《资本论》,中文版,第1卷,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㉒哈里斯:《货币理论》,中文版,2页,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89。

参考文献:

- 1.Blaug,M.,1997 . 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Moseley,Fred,2005 . Marx's Theory of Money: Modern Appraisals .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 Ltd..
- 3.Wood,J.C.,1988 . Karl Marx's Economics: Critical Assessments . New York:Croom Helm Inc..
- 4.Kaldor,N.,1982 . The Scourge of Monetarism .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5.Barro,R.and Fisher,S.,1976. “Recent Development in Monetary Theory.”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2,pp.133-167.
- 6.King,R.G.,1983. “On the Economics of Private Money .”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12,pp.127-158.
- 7.马克思:《资本论》,中文版,第1、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 8.斯密:《国民财富性质及原因的研究》,中文版,上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 9.伊特韦尔等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文版,第1-4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
- 10.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文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 11.弗里德曼:《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结构——与批评者商榷》,中文版,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
- 12.瓦尔拉斯:《纯粹经济学要义》,中文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 13.哈里斯:《货币理论》,中文版,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89。
- 14.帕廷金:《货币、利息与价格》,中文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 15.熊彼特:《经济分析史》,中文版,第1、2、3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 16.史密斯:《货币经济学前沿:论争与反思》,中文版,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 17.罗西斯:《后凯恩斯主义货币经济学》,中文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 18.樊苗江、柳欣:《货币理论的发展与重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 天津 300071)
(责任编辑:S)